

俄 罗 斯 经 济 现 代 化

——工业政策隐性继承视角的分析

曹 英 华

1998年前后,俄罗斯经济曾一度出现了止跌回升的迹象。但由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大跌(1998年11月“布伦特”原油月均价低至每桶11.5美元),主要依赖石油出口获得财政收入的俄政府既无法偿还已到期的各种债务,也无力维持卢布汇率走廊的稳定,最后不得不延期偿还未以主权名义担保所借的债务。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尚未发育成熟的金融市场既无法迟滞大量外资的流出,也无法吸收到国内的投资资金,空壳现象凸显;股市的衰败使以短期债务为经营主业的中小银行纷纷倒闭破产,大银行负债急剧增加;巨额财政赤字及不断累积的外债合力使卢布在1999年年底贬值75%^①。

随着世界不同类型经济体经济的复苏,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形势的趋好,国际石油和原材料市场价格随之上扬。此时,普京主政的俄罗斯开始调整转型初期在目标模式、路径上的偏差,强化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国内外良好的环境使俄罗斯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普京主政的8年间,俄GDP总量增加72%,居民实际收入增加1.5倍,国家外债仅占GDP的3%(外债国际标准底线),吸引外资达823亿美元(2007年),国家外汇储备为5 683亿美元。然而,这一连串良好的指标也没能抵御住2008年更大范围和程度经济危机的冲击。

200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的主要诱因是企业债务,而非1998年的主权债务,但危机发生过程却极为相似。2008年6月俄证券市场出现跌势,外资急速大量出逃加剧了股市崩盘的速度,卢布贬值促使国内居民挤提银行资金(包括美元储蓄),于是金融机构可支配的资金量骤减^②。资金短缺首先打击的是国内较为活跃且具有高产业关联度的建筑业和冶金工业,

作者系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① 梅新育:《国际金融危机传染的新特点》,《中国金融》2007年第18期。

② 李新:《俄罗斯经济的特点及其根源》,http://www.sisi.org.cn

由此引发失业增加、相关产品滞销。此时，欧美主要经济体经济也跌入二战后的最低谷。俄不论是依靠举债，还是出口能源和原材料，均无法获得偿债和维持企业发展的大量资金，经济陷入困顿状态。

2008年危机导致2009年俄GDP负增长7.9%，工业负增长11.8%。不佳的经济表现使俄不再是“基础四国”和“发展中五国”的成员之一^①，俄社会经济再次被边缘化。

虽然1998年和2008年经济危机的诱因不同、传导机制各异^②，但对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俄罗斯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俄政府痛定思痛，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摆脱与自身潜力不相符的世界能源市场供应者的身份，加速实施普京批准的《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和梅德韦杰夫在2009年11月总统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任务。在逐渐摆脱危机的同时，俄罗斯以现代经济体的面目参与全球经济循环。

一 俄经济现代化政策的主要特征及措施

《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和梅德韦杰夫在2009年11月总统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任务，两者一脉相承，且具有很大的内在逻辑关联性。

(一) 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对象

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俄罗斯20年转型，在支付了巨大的转型成本后也获得了制度变迁的收益^③。一系列成就的取得既与其融入全球经济循环有关，更与其推行的转轨战略密不可分。换言之，若没有这场大规模的转型，即使目前仍受到质疑的成就也难以在旧体制内取得。

即便如此，俄宏观与微观经济领域中的历史遗留问题仍没有借助转型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经济(产业)结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苏联时期“轻轻重重”的局面，第三产业

也获得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但这并非是借助有效和科学的产业政策调整形成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不同产业借助经济贸易自由化，由自然衰落与复兴而来的，极具自生自灭的无奈^④。对于类似俄罗斯这样的大经济体而言，制造业的衰落无疑意味着国家竞争力的整体下降。

第二，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但苏联时期低效及非集约化的经济模式并未改变，相反确有加剧的危险。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营主体，引导其经营行为的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收益比较。在俄罗斯，在可以以低成本自然资源替代高投入技术且收益短期不确定的约束条件下，经营者合成推理的结果就是增长方式愈加低级和“惰性”。

第三，苏联曾在“两个平行的经济世界”理论指导下，在经互会内以分工指导者和资源供给者定位。转型以来，俄罗斯资源供给者既以“简单地依靠原料出口来换取成品”的身份非但没有改变^⑤，而且在市场需求规模和种类扩大的诱惑下，其发展模式与世界经济主流和主体渐行渐远，却与危机形影相随。

基于历史教训、内外环境、经济发展的基础与现实的迫切性，俄罗斯现代化的主要对象或切入点选定了工业尤其是能孕育高效生产工艺和生产精密加工型产品的基础工业，包括航空航天领域、造船业和能源动力领域以及信息、医疗和其他高新技术领域。围绕这些优先发展的领域，2009年5月由时任总统梅德韦杰

^① 程伟：《俄罗斯将反危机和现代化结合起来》，<http://finance.sina.com.cn/hy/>

^② 刘军梅：《应对金融危机：从比较中看俄罗斯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东北亚论坛》2007年第8期。

^③ Е. Ясен, Социальные итог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или двадцать лет спустя//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1. №8.

^④ 程伟、殷红：《俄产业结构演变研究》，《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1期。

^⑤ Д. Медведев, Россия вперёд, <http://xn--dlabbg6aiuy.xn--pali>

夫挂帅的经济现代化和技术发展委员会确定了38个具体项目，并在莫斯科近郊创建了类似美国硅谷的现代化孵化基地——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

由此可见，俄以工业为主要对象、借助技术创新的现代化旨在用最短的时间，从根本上解决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过程中恶化并制约国家竞争力提高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及发展模式问题。

（二）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主体

转型初期，为构建以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经济制度，俄大规模地推行私有化、自由化。这一激进转型的结果，从根本上摧毁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高度行政垄断的制度基础，为孕育不同经济主体并参与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上的保证。然而，由于转型缺乏较为完备的社会、法律制度基础，所有权的变更并没有催生有效的微观经济主体，也没有形成相应的竞争激励机制。在原有的经营方式和企业间联系被打破的同时，新的经营方式和联系却无法在短期内自动生成。出于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球竞争的考虑，俄政府试图依靠大型私有化工业企业和银行组建金融工业集团，结果是一批带有劫掠国民财富、“俘获”政府、左右政局性质的金融寡头集团的出现。作为经济微观基础的企业衰落，使整个社会经济陷入瘫痪的状态。

普京主政后，在整肃金融寡头的同时，逐渐修正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偏差，积极鼓励发展中小企业以适应多元化国民经济生活需求。2007年，俄开始组建俄罗斯纳米技术公司等六大国家公司（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корпорация），六大国家公司业务涉及金融、纳米技术、核能、武器和高技术、住房和公用事业改革、奥运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重点领域。组建国家公司旨在彻底摆脱国民经济颓势，提升民族经济竞争力，同时强化国家对重点经济领域的调控。这些国家公司并非是转型过程中市场运作的结果，而是借助政府的强力推进且以立法的手段，集国家财

政、金融、人力等资源组建而成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政府附属品的特征。

俄社会对国家公司的态度杂陈：一方面担心其非市场化运行的结果会逐渐蚕食私有企业及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阻碍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甚至将国家经济重新拖回计划经济的旧穴；另一方面期冀其承担起振兴国家经济，实现国家现代化并重新确立俄罗斯世界大国地位的任务。

在经受了1998年和2008年两次经济危机冲击后，俄社会开始重新审视国家及国家主导的大型企业在应对危机、实现国家经济现代化方面的作用。

（三）经济现代化的根本性特征

简要分析俄此次经济现代化的背景，就不难发现：与俄历史上曾有过的大规模现代化相似，此次现代化也是由外力冲击所致，也是由执政者（政府）主导并通过强制性手段加以推进的，而选择的对象均以工业或服务于工业的领域为突破口。

虽然俄此次现代化是在制度转型趋于完善过程中启动的，且面临着“入世”后更广阔的发展平台和诸多政治经济约束条件，其政策的历史继承性不会太明显，但亦无法中断。这就意味着俄对内、对外政策表现得会更加隐性。

二 俄经济现代化 政策形成的根源

（一）显性传统的影响

作为一个专制统治时间较长、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俄国内在发展模式上曾有过“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之争。虽然俄自彼得大帝开启西化模式后极大地缩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固有的民族文化心理使其发展政策与路径一直异于先进经济体。最为常见的表现就是：一旦国内经济受到国外力量冲击，不同的利益集团（甚至政府本身）就会采取各种手段保护国内经济的生存与发展。

1724年，彼得大帝采用了旨在保护国内生

产、限制进口的保护性关税：对本国可生产的进口商品征收 75% 从价税；对不能生产的进口商品征收 3% 从价税；对国内生产用原料一律免征关税。

伊丽莎白时代的 1757 年，是俄贸易史上执行最高进口关税的年份之一。为保护国内铁及铁制品工业免受外国厂商的竞争冲击，这一年对铁及铁制品的进口关税高达 100%，而 1766 年的进口关税高达 200%。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 1796 年，政府提高了对部分制成品的进口关税；在保罗一世的 1797 年，政府不但扩大了进口商品课税的种类，而且对其中的 208 种商品则完全禁止进口。

亚历山大一世执政的 1822 年，曾禁止 300 种商品进口，对铁征收高达 600% 的关税，但对国内工业发展急需的机床及其他设备则免征关税。

上述关税壁垒活跃的时期，也正是俄工业扩张乃至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外联系不断加深的时期。关税政策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相关产业成长提供了空间，但降低了消费者福利，更削弱了受保护产业的竞争力。

(二) 隐性传统的影响

关税政策的应用，的确可以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保护国内相关产业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培育经济竞争力，但也会遭到贸易伙伴的诟病。因此，俄政府还采取了如国家优惠贷款、国家订货和国家救济等其他经济手段。

1754 年，根据伊丽莎白的命令，俄成立了商业银行。该银行以年商品 6% 做抵押，为在彼得堡港从事贸易的俄商人提供 1~6 个月期限的贷款，贷款的额度为抵押金的 4 倍。1860~1917 年，国家银行成为政府执行贷款政策的最重要的工具，而贷款的主要目的就是激发工业生产积极性。

除了提供发展工业生产的贷款，沙皇政府还以批发式购买者的身份即国家订货解决工业生产的销路问题。同时，它还积极举办工业艺术展览会，以向国内外推介俄罗斯的工业产品^①。

粗略梳理俄罗斯几个重要发展历史时期的工业政策就可以发现，政府一直将工业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而开放条件下政策的应用则采用了显性和隐性相结合的方式，其目的就是激发国内主导产业的潜力，培育其竞争力。

三 俄经济现代化与中俄经贸合作

对俄罗斯而言，以工业现代化为突破口来摆脱世界能源与原材料供应者这一与其大国不相称的地位，阻断“荷兰病”继续蔓延，进而全面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战略，既是客观的，也是必要的。然而，仍处于转型期的俄罗斯，其内部尚不完善的政治经济基础在短时期内无法为现代化的全面实现提供制度性保障，现代化尤其是工业现代化的政策仍会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路径依赖，国家及国家政策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依然强大，而这必然会体现在对外经济往来中。

中俄贸易关系虽在近 10 多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仍落后于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绩效更无法与一直宣传的中俄经济结构互补相映照^②。这一不协调局面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中俄资金短缺及经济危机冲击等，但更多的源于政策层面，包括一直受到诟病的“灰色清关”、俄投资经商环境不善、中方早期输俄假冒伪劣产品的滞后效应等。

俄罗斯此次现代化战略的提出，几乎是与其冲刺 WTO 并行的。加入 WTO 既会为俄营造宽松的国际经济环境，降低实现现代化的成本，也会为其贸易伙伴提供更多的贸易与投资契机。中国借“入世”调整、规范了自身对外贸

^① Н. С. Киняпина, 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в годы кризиса феод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65. №6.

^② 仅以 2011 年为例，中欧贸易额为 5 672 亿美元，中美贸易额为 4 467 亿美元，中日贸易额为 3 449 亿美元，中韩贸易额为 2 139 亿美元，中泰贸易额为 580 亿美元，而中俄贸易额仅为 835 亿美元。

易行为,使其符合规范化、法律化和国际化的要求;俄罗斯“入世”后也会调整其内外经济、法律制度,经济环境势必会发生极大的变化。中俄经贸多年存在的问题及不利因素会借助WTO规则逐渐得以消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俄经贸关系就可在WTO框架内实现“无缝”对接,出现一个质的跨越。相反,为服务于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需要,俄罗斯在调整处理其对外经贸关系时势必会有效地利用WTO的相关规则。这样一来,中俄经贸中既会出现一些新问题,也会使一些老问题以新的方式再现。

俄罗斯借助工业现代化而实现经济全面现代化,立足点就是从国家层面采取积极的措施,在国内外市场上支持那些研发高效生产工艺和生产精密加工型产品的企业,把资源集中于具有竞争力、为现代化创造先决条件的行业。在对外合作方面,将高新技术合作开发的对象锁定为欧美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只是其高新技术产品的下游销售市场。另外,在知识产权保护下,中国对俄方一些技术的获得将受到更多的限制,其难度将不亚于与欧美发达国家间的合作。

在互利共赢的原则下,中俄双方企业曾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开展了极为密切的合作,中方已在某些领域具备了一定的竞争优势。随着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俄势必会在一些领域发生竞争,双方为各自产业、企业利益考虑,由此而带来的诸如补贴与反补贴、倾销与反倾销的贸易战则无法避免。

虽然“入世”后俄政府再无法利用高关税限制部分产品输入,但可以利用如“绿色壁垒”和“技术标准”等非关税壁垒来限制进口。中国输俄的轻纺产品及农产品,就可能成为俄阻击的目标与对象。这一点,中方在与其他国家进行经贸往来中曾有过深刻的教训。

虽然“入世”后俄壁垒森严的金融与投资市场以及为各国商家所诟病的执法贪腐、市场排他和政治寻租等问题会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但这个习惯自定规则的昔日庞大帝国,不可能迅速受制于WTO的自由贸易规则。这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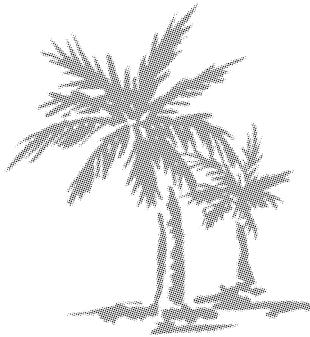
面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俄每一个支柱性的产业都有国家集团,这些产业集团不受司法管束,在有助于实现国家现代化战略的同时,也会限制行业内的竞争,妨碍国际经济合作^①。

四 简要结论

在简单梳理俄罗斯几个重要发展时期的工业化政策时,都会发现国家作用或隐或显,呈现一定的历史继承性。而在俄融入全球经济循环的背景下,其政策的继承会更多地表现为隐性,其体现方式也是多样的。

俄“入世”及其目前政局的变化会为中俄经济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契机,但也会出现新的问题。契机转化为现实与福祉,需要中俄双方共同努力;而对出现或即将出现的问题,在不回避的前提下,中方应吸取与其他国家经贸往来中的教训,提出前瞻性的解决方略。唯有如此,双方才有可能在出现问题时不伤情、不蚀本^②。

(责任编辑:高德平)



^① 李建民:《俄罗斯国家公司形成特点、功能及影响》,《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8年第1期。

^② 中俄间“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及“经济结构存在巨大互补性”的宣传与界定激发了中方投资者及经销商对俄市场的极大热情,但由于没有从历史的角度把握俄对市场的态度以及自身存在的问题,所以近10年对俄经贸的成就并不遂人愿,再加上业内人士所遭所遇,就出现了“伤情蚀本”的结局。